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观文丛

The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
社科名家文库

王焱

社会思想的视角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观文丛

社会思想的视角

王焱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思想的视角 / 王焱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8-10412-8

I. ①社…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思想—思想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B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405 号

社会思想的视角

王 焱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42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412-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博观文丛》序言

两年前我受命组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暨知行文科实验班,对于如何在一个理工科强势的大学开展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和高水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胸中隐有沟壑,但仍感举步维艰,好在诸位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加上一批青年才俊的加盟共进,遂使我们的探索逐渐走上一条教书育人的正道。

记得高研院创建不久,我与年轻的同仁们就筹划编辑三套文丛,分别起名为:博观、通识和知行。《博观文丛》旨在收录北航高研院讲席教授及其他教授学者的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研究、社会评论和为实验班的讲课纲要结集出版,呈现高研院各种师资力量思想风采;《通识文丛》则是北航高研院的集体科研报告,集中于国内外通识教育的精粹选章和评议,彰显我们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以及实践与经验;《知行文丛》作为北航高研院的学术院刊,以青年讲师为主编,文史哲入口,政经法出口,厘清每辑主题,从容打造我们的思想旗帜。经过两年来的辛苦操持,三个文丛现都已陆续底定,不久即将面世出版。

今日为《博观文丛》写序,对于我来说可谓一件“轻省的重负”。昔日苏轼《送张琥》曾有云:“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曾国藩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写道:“著书之多,与茶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面对第一辑九册我的学界朋友的“呕心”

之作,除了感铭之情,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们北航高研院持守的理念。这一点我曾经在即将开通的北航高研院网站,以院长致辞的名义写过,现不妨抄录如下:

思我中华,历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已有百十余年,然自由、民主、宪政之中国仍在艰难的建设途中。一个国族之兴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教育当为根本,百年前梁启超就有新民之说,国民之教育,人才之培养,关涉中华未来。大学培育何种人才,虽见仁见智,但不可讳言,凡数十年来,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畅行于世,精神品质的塑造丢弃久矣。在我看来,通识教育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自由教育,培育自由的人格,塑造伟大的心灵,才是我们的办院宗旨。鉴于此,我们的通识教育面向古今中西的经典,从三代之治到新旧经学,从雅典民主到国富新论,由古典传统开辟现代新章,击沧浪之水汇通英美海洋。让同学们在我们的研究院经受人文精神的激荡,进而在毕业之后投身社会的改良,经纬人生,成就志业,这才是我们的所愿。

《博观文丛》的出版必定会引领我们朝向那片“自由的海岸”。

高全喜

2012年3月21日于北京

我的“秘密书架”

（代前言）

如果从 1973 年我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起，迄今已经过了整整四十年。在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发现，大凡在学问中讨生活的人，对于让外人参观自己的书房这件事，大都心存忌讳。他们视自己的秘密书架，好比金屋里藏的阿娇，或者贪官的银行户头，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不愿意轻易示人的。

对于古人来说，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古代文化传播的条件有限，学人出书、购书、读书都非易事。东汉时的文人蔡邕，原本学问平平，后来忽然学问大进，笔下生风，舌灿莲花。他的两位朋友猜测他不得异人，必得奇书。某天趁他外出，终于在他卧室的枕头下面翻出一本王充《论衡》的抄本来。蔡邕无奈，只好与他们两人共享此书。而汉代大学者扬雄的“秘密书架”中，据说有一本罕见的词典，别人向他索借，急得他几乎要跳楼。也正因此，近人刘成禺曾说：“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有位朋友与我不时谈文论学，不知怎么竟怀疑起我有什么秘本不肯示人。有好几次光临寒舍，未经邀请就径奔我的书房，意图翻检我的“秘密书架”，结果每次都大失所望，怏怏而返。弄得我也很尴尬，恨自己为什么竟不能也拥有几本孤本秘籍，可以拿来与这位朋友共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学问大进呢？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在社会上成为可能。这对于想要读书的人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拥有独门秘籍的人却又成了一件惨事。试想,在当下信息如此涌流的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常人得不到的“武功秘籍”呢?如果有,恐怕说的大都也是些“挥刀自宫”之类的法门,轻易尝试不得,不如不读为妙。

对于一个拥有男性气概的人来说,追求权力、财富、知识、名望乃至女人,本来都是天下最正当不过的事,实现这些欲望,各有各的路径。可历来劝学之人,总是竭力渲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一味作虚假广告,使人误以为读书不但可以增长知识闻见,而且可以为官作宦挣得千钟粟;可以发财致富获取黄金屋;甚至于还能够抱得美人归娶来颜如玉,有些穷措大更说些什么“拥书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之类的疯话傻话。结果,想要当官的,想要发财的,想要泡妞的,一股脑儿都跑来买书、读书,等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后悔入错了行,再想改换门庭也晚了,于是就只好以学苑为官场,拿学圈当商圈,大肆操练起来,结果弄得今天的一些读书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文不武不衫不履,连白道黑道也说不清了。大学与科研机构中更是各种丑闻不断。凡此种种所在,既同官场,又像商圈,是一个柔媚争宠的风月场所,更是一个阴谋术数的名利渊薮,怎么看,也不大像是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我以为,喜欢读书,其实和热衷于斗蛐蛐、玩葫芦之类玩物丧志的事差不多,并无多少神圣之处。古人说寒窗苦读学会舞文弄墨是雕虫小技,其实,这倒是更接近生活世界的真理。所以“读书改变命运”之说,实在是误尽天下苍生。

这种“读书有用论”所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后果,就是各色人等一窝蜂地冒出来胡乱写书、攒书、出书,结果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缺乏别择,难免让人目迷五色。让读者浪掷金钱还是小事,误人子弟却是一桩大罪。小说家昆德拉当年就曾感叹,在于今这个大众社会中,“写作癖好在人群中如此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

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是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结果，无论阿猫阿狗，长三阿四，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写书、攒书、出书，这固然体现了现代社会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大趋势，但无人倾听，无人阅读，写书出书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昆德拉曾经预言说：“一旦每一个人心那个沉睡的作家苏醒了（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相互成为聋子和哑巴的世界，一个互相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一天在中国，其实已经提前来到了。

我以为现代学者大多其实并无什么秘本，但是每一个像样的学者都有其基本的学术资源。世上好书无限，但一个学者真正阅读功深的，其实也许就只有几本而已。就凭借对这几本书的刻苦钻研，他就拥有了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能够在学术天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了。如同当今中国的富人都不愿谈自己原始资本的来历，学者们对自己文化资本的来历往往也都讳莫如深，因为“秘密书架”一旦“走了光”，学人身上的光圈也就暗淡了。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曾纂辑俗语雅谑，以类相从，名为《杂纂》。其中“杀风景”一条下有“松下喝道”、“花上晒裋”，等等，而今而后，如果还要再加上一条，那恐怕就是学人的“秘籍曝光”了。

(1) 以塞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本)：“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从希腊人的这一隐喻中获得启发，进一步发展出思想史研究的两种理想类型，用以阐释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不同思想类型。其实，伯林本身便是一位狐狸式的人物。他从不指望用一个万能的思想体系去解释一切。他由价值论的多元论发展出方法论的多元论，即研究方法可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恐怕才是他偏爱“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思想史来拓展政治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便不能用刺猬的标准(一元论的万能体系)来衡度狐狸的才情(多元论的思想风格)。他月旦人物，裁量文章，不但能够一语传神，而且谑而不虐，饱含智慧与幽

默。对于那些观念性情风格绝异,文化背景也迥不相侔的人物,他尤擅内敛于这些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思考体会。牛津爵士一生身泰名遂,可他对于那些笔端老辣多刺,思路犷猛怪异,性情畸零寡合之徒,如马克思、巴枯宁之伦比,偏偏独多精识慧解,犹如老吏断狱,推理层次分明,往往是一捋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回看二十世纪群星灿烂的众多思想家,有的思维缜密,有的聪明过人,有的学识渊深,有的功力超群。相形之下,伯林也许并不算特别出众,但我仍愿将他的书列入我的“秘密书架”。

(2)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本):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我辈凡夫俗子,只能望洋兴叹。苏联的学术界喜欢对西方学者进行大批判,惟独对韦伯,还是不能不惊其卓识而服其渊博。现在这部书有了冯克利很好的译本。如果力图全面理解韦伯的思想,可以从这本书入手。这是两篇堪称经典的演讲,语言朴质无华,没有修饰,以至有人说就像是“一块未经修饰的岩石”,而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征服了我。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后来的思想家和学者竭力腾挪躲闪,其实都未能跳出韦伯的光圈。在韦伯看来,处在今日这样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应承每日的当下事务。他不仅批判那些各式各样的讲堂伪先知,而且还给那些祈盼先知的年轻人们大泼冷水说:“想寻求先知的,应当去教堂!”雅斯贝尔斯曾说韦伯是哲学的道成肉身,良有以也。

韦伯深知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导致专业化的宿命,他的对治之道是,对自己将要涉猎的领域拥有足够的知识:一方面要比“专家”掌握更多的知识细节,同时又要比所谓“专家”具有更广博的知识结构、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强烈的人文社会关怀,从而构建出更具本质性整体性的知识框架。对于这样的学者,我们称之为社会理论家(social theorist)。

2010年元月10日

目 录

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	1
史家陈寅恪	48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变	
——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考察	58
民国的“魏玛时代”	97
转型时代的政治枭雄	103
谋略：“没有仁爱的知识”	106
经学的前世与今生	111
从近代历史看东亚的未来	124
经济全球化挑战下的东亚生活文化	130
托克维尔社会思想的政治之维	141
苏格兰启蒙学派与法国古典社会思想	174
储安平视野中的英、法政治文化	195

文明的冲突与国家的身份

——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206
伯克与自由的智慧 ·····	232
黑格尔哲学左派与右派之战 ·····	237
基辛格《大外交》的启示 ·····	240
制度主义研究的新范式 ·····	243
行政支配与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	246
《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前言 ·····	250
《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前言 ·····	259

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清）张之洞

如果陈寅恪先生今天还在世，他应已是年逾百岁的老人了。这一百年来，棋枰翻覆，变幻如斯；历史烽烟，苍茫难穷。陈寅恪出生不久，适逢甲午战败，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壮年的陈氏，遭逢日寇侵华，大半个中国的国土沦于敌手，致使他被迫转徙流离于西南天地之间；晚年，竟殁于惨烈的文化浩劫之中。

英国史学家卡尔有言：“欲研究历史，先须研究史家。”陈寅恪生处的时代，正是华夏文明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危机空前深重的时代。处在这一激荡的百年背景之下，“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的陈寅恪选择了以史学为业来回应这一危机，因而其学术体系、政治文化理念，对于我们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

陈寅恪自幼便受到中国古典学术的严格训练。从少年时代起，他便负笈远游，“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在将近二十年里，欧美许多著名的学府都留下了他求学的履痕。在这期间，他掌握了多种语言，广泛涉

* 本文原载《自由与社群》，“公共论丛”第五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这次收入文集，个别字句有所调整。

猎了欧美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但与并世那些浮慕西方的学者不同，他很少谈及自己受到过西方学人的哪些具体影响，而其学术风格也完全是中土的。他也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通论性的文字。凡此，都为我们探寻其思想体系、学术渊源带来了诸多困难。在近代中国学术界，他为从事学术研究所作的艰苦准备，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对学术的庄严虔敬态度，表明他是把学术研究视为自己生命的终极托付。可惜天丧斯文。他中年失明，晚罹动乱，未能尽展其所学。这就很容易使人得其片言，据其一体，作以偏概全之论。

随着近年陈氏的学术手稿、资料的陆续整理问世，这些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诸家的解说探讨，各擅胜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这位史学大师及其著述的认识。但即便如此，由于前述原因，其史学内蕴尚未完全得到阐发，特别是关乎陈寅恪思想学术的总体征别上，仍存待发之覆。故笔者不揣简陋，拟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更进一解。

文化史与政治史

说起陈寅恪，首先令人们叹服的是其渊博。确实，陈寅恪一生的治学范围极其广博。作为后学，今日诵读先生之书，仿佛建章宫中，千门万户，孙武囊底，八地九天，借用陈先生论王国维的话说，真使人有“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的喟叹。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寻绎他一生的治学方向和重点，就会发现，除了在归国初期从事“佛教义理，天竺影响”的研究外，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忽然放弃了自己独步天下的中亚语言文字知识，将研究重点渐次转移到中古史方面，即他自己所谓“不古不今之学”。而从五十年代中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又转而从事明清史事的研究。

义宁陈氏一门实为清季民初政治文化的枢纽。然而“家国旧情”与“兴

亡遗恨”系于一身的陈寅恪，却选择了以史学为业。与陈寅恪“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说：陈寅恪研究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①。牟润荪先生则说，寅恪先生“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史……即此一端就足以知道他老人家所向往的是司马温公”^②。

从他一生治学重点的变化不难看出，正是内忧外患的煎迫，使多才而敏感的陈寅恪走上了史学经世的路向。中国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顾亭林谓：“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③陈寅恪以毕生精力在历史中上下求索，意图正在于从中窥知中国政治文化在二十世纪大变局中的前景与命运。

根据陈寅恪的自述，他的中古史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一为“中古政治文化之史”。他的两部中古政治史专著均以“稿”为名，其实并非自谦，因为“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④。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陈氏计划中的《中国通史》实即一部以文化通观历史的史著，而《中国历史的教训》则是一部政治史专著。

陈寅恪的史学体系是文化史，即认为中国史即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这里所说的文化史，并不是通常与政治史、经济史对举意义上的文化史。对于陈寅恪来说，文化史是他根本性的史学体系（限于篇幅，关于陈寅恪的中古文化史研究，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他的政治史，则是隶属于其文化史体系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西累（J. R. Seeley）有言：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自有史学以来，政治史就是其中的主干。那种孤立地就政治言政治的政治史研究，在

① 台北传记文学社编：《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社1978年版，第3页。

② 《谈陈寅恪》，第72页。

③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④ 《谈陈寅恪》，第13页。

史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这种政治史因为不能从更高的角度超越政治，因而看不到文化与政治间的相互联系。陈氏的政治史研究与此迥异。他视文化为政治的深层结构，着重探讨的是文化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因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他毕生重视文化系统，侧重从文化角度分析社会政治。例如土族政治是中古政治史的核心问题，而在陈寅恪看来，土族的标准却不在累世显宦而在经学文化。对于中古种族间的胡汉冲突与交融，他主张“有教无类”，在文化不在血缘。即使是通常被认为纯属政治问题的藩镇割据，在他看来深层依然是文化的冲突。陈寅恪就这样通过由政治（部分）而文化（整体）的相互诠释，不断扩大解释学循环圈，通过政治与文化互动导致的历史结果求取通则，从而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开辟出文化史的政治史领域，并在这方面创获颇丰，多有发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史体系。

陈寅恪的中古政治史研究，在时期与内容上与司马光的《通鉴》多有重合，他不止一次在行文中称赏《通鉴》为政治史的杰作，赞叹宋贤史学的今古罕匹。为陈氏推重的曾国藩，在史学方面亦推崇《通鉴》。他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中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尤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无疑，司马光的史学为陈氏政治史学的渊源之一。不过《资治通鉴》仍属于传统的政治史著述。自今天看来，其主要不足即在于作为政治史不能与文化史打通。《通鉴》虽也有文化史部分，如上引曾国藩所述，但这些部分在《通鉴》中不过是政治史的附庸。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通鉴不载文人条》中就曾对此予以批评。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也可以视为对《通鉴》这一类传统政治史的批判。而现代人撰著的通史，其政治、经济、文化部分却又往往各自孤立，相互割裂，了无关涉。与司马光不同，陈寅恪的文化史体系，是以文化的视角通观历史。这种文化史的政治史，

似乎与“以权力及其运用”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相对立，实际上却是对那种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把政治化约为文化，也不是把文化化约为政治，而是既注重两个领域的自主性，又注重二者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使往昔作为政治史附庸的文化史蔚为大国，并据以审视政治史。

“中古政治文化之史”

当陈寅恪开始从事中古史研究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他在这一领域中具有扫榛辟莽，前驱先路，发覆千年之功。

通常所谓“中古时期”，泛指从汉末群雄并起，三国鼎立，西晋篡魏，八王之乱，中经“五胡乱华”，南北划江而治，东晋偏安江左，直至隋文帝重新统一华夏，李氏父子踵继崛起，建立唐帝国而终至覆亡，这样一个长达七百余年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以往的史家视杨隋前的四百余年为充满战乱、饥馑和民族冲突的黑暗时代，几于不堪回首，而将隋唐特别是中唐视为千载一遇的盛世。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曾经说过：“思考历史即是对历史作时代分期。”陈寅恪不取以上通常的政治史分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祇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其中古文化史之上限，起于东汉金人托梦，佛教东来，下迄于宋代新儒学的建立。上下限比通常的政治史分期都有所延伸，大约一千年。现存陈氏学术成果关于宋代的不多，但根据他多次表示对宋代文化的向慕，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天假以年，陈氏不会不把他的文化史研究下推到宋代的。这从他的《论韩愈》一文中便可窥见消息。陈氏曾在多篇文章中对“新宋学的建立”反复申说，北宋代表了他的

学术文化理想。他认为“华夏文明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陈寅恪的政治史是隶属于其文化史的,因此他的中古政治史研究,也以这大约一千年的时段作为研治领域。他所以选择这段历史,除了因为与他所处的时代存在一种相似性,他期冀通过研治这段历史求取现实的启示与鉴戒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即在于,惟有通过如此长期的历史,才能通观和把握中时段的结构。对于中古政治史,陈寅恪曾提出著名的“关陇集团本位”的命题,开掘出这一崛起关陇,混一胡汉,“阳附周官之经文,阴适胡汉之现状”,宰制华夏中古政局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军事贵族集团的兴衰历程。这是孤立的断代史研究断难为功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主张长时段,而反对传统的事件史。自年鉴派史学看来,所谓结构,就是在历史过程中,一些持续而稳定的因素所形成的基础模型。由于这些模型变动得极为缓慢,因而会造成持续的长期影响,因此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掌握这些基础模型或结构,才能够在复杂的历史现象的背后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脉络所在。而传统的事件史注重的不过是一天开花,迅疾凋谢的独一无二的事件。一场战争,一次官场的争权厮夺,一篇重要的演讲,一通关键的信函,在历史的长河里都不过是瞬间片刻。^② 陈寅恪既吸取年鉴学派的中长时段史学的长处,又重视事件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宏观上常能上下千年,纵横万里,通观总揽。微观上则善于抓住标志长时段结构转换的事件,洞幽烛微,极于毫芒,故往往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如唐代士族李德裕应科举这样的纤芥小事,为通常史家所忽略,而在陈寅恪的政治史中却能成为重要事件,因为它标志着士族政治衰落转向科举制的中古历史结构上的大转折。

文化以制度为依托,制度以文化为其内容。这是陈寅恪将其文化史体

① 陈寅恪曾著有《五代史记注》,可惜此稿在他转徙西南之际遗失了。他在《致刘永济书》中叙述此书旨趣说:此书“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原信见《陈寅恪先生遗札及佚诗》,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

② Fernand Braudel, *Ecrits sur l'histoire*. Flammarion, Paris, 1969.